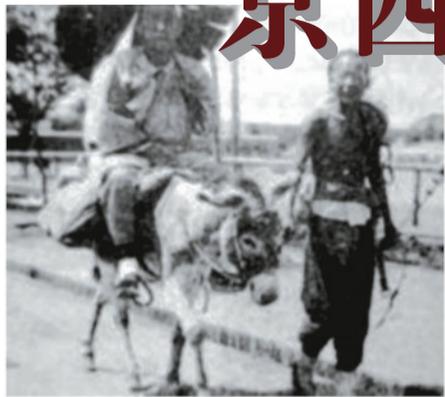


# 京西饮水习俗之变迁

门学文



“水是生命之源”，这句话道出了京西人生存和发展的依靠！京西民众的先民大多数都是从元代以来逐步迁来北京的，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。耕作靠水，养殖大牲口靠水，洗衣做饭离不开水，招待亲朋好友也以水为媒介，因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饮水习俗。纵观京西的饮水习俗，大体经历了如下变迁。

饮水用上方面可分为以下种类。

河水和井水。京西有“西灏浑河(永定河)的天然优势”。饮水靠河，是最早的自然生态。其后，随着生活面积的扩大，凿井成了生活的必需。村村镇镇都有凿井的历史，如模式口、北辛安、衙门口都曾存在大量古井，有的古井历史在2000年以上。古井的提水方式有轱辘和花车两种，时代越近井越深则花车井就越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人们的饮水多是靠河水和井水，井旁提水、挑水和骆驼等大牲畜在井台饮水成为生活一景。干旱时节，河干井枯，人们只能祈求龙王老爷的关照。因此，每个村镇的龙王庙成为人们敬重的神灵处所。一般季节，京西的水质优秀，水从井里提取后可直接饮用，煮饭几天内不变质，沏茶则水质甘冽爽人。有朋友来，从水缸内舀来一余，放到灶膛里即时烧开，沏茶而炕上敬客，则主客皆大欢喜。夏日里，井拔凉水是京西人的最爱。京西名泉多，有龙泉、将军泉等，城内权贵争相前来品评饮用，无不留恋羡慕。1932年，北辛安人用镇内井水造出了天下闻名的“太阳牌二锅头”烧酒，成为京西一大盛事。那时候喝水靠井，仿佛天经地义，毋庸置疑，成为

习俗。

自来水。1940年前后，北辛安开始有自来水。自来水，西洋发明，其实是经过一定净化处理的河水或井水，由管道引至饮水所在地，通过开关控制即可饮用。由于饮用方便，大受京西民众欢迎，逐步形成饮用习俗，但家中水桶水缸余余必不可少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自来水普及，石景山区平房家属区内视为寻常。即近旁水井，也必改造成自来水，才可放心饮用。人们日常饮用则瓢舀，甚或喝“撅尾巴管儿”；待客则在火炉内将水壶的水烧开后，转入暖水瓶内保温，再倾入客人杯盘碗盏沏茶，以示热诚。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，每个自来水管旁是家属区生活聚集地，人们在那里洗衣洗菜涮墩布，通报家长里短并谈心交心。偶尔停水，人们还必须赶到较远地方的自来水点提水。冬天自来水的控制开关上冻，则一定有“热心人”提壶热水于凌晨浇开龙头，方便大众。自来水，成为人们生活习俗和生活安定之必需。

桶装水和瓶装水。桶装水和瓶装水进入京西，始于改革开放，普及则在近十几年间。由于桶装水和瓶装水的方便卫生，也由于自来水的价格不断上涨和饮水机的普及，人们饮食卫生的观念改变，它们逐步进入甚至占领家庭、企业、单位的饮水阵地，成为京西新的生活饮水方式。水成为商品，是京西人们始料不及的。但石景山区城市化的飞速进步，使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新事物。现在，哪个家庭、单位没有桶装水和瓶装水，一定是件新鲜事。虽然还有自来水，但已没有水桶和水余，几乎绝迹了茶炉和暖瓶。如今，在饮水机前接水沏茶成为家中的平常事，客人到了家里或单位，准会享受到京西人用桶装水沏出的热茶；而出远门旅游，人们也一定带上桶装水或瓶装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在饮水器具方面的演变。水缸、水桶和水余流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，几乎家家必备。水缸。

陶制器皿，U字形，有大、中、小三种。大的高到胸，可盛一二百斤水；中号的齐腰，可存百十斤水；小的高过膝盖，可盛四五十斤水。缸上一般有盖子，上放水瓢水舀子以备取水。河水或井水倒入后，可起澄清作用和储蓄作用。如今，水缸在年轻人眼里，差不多已成“文物”了。

水桶。早期为木质，后多为铁皮制作，圆柱体，中空，有提梁，能盛三四十斤水，是人们去井里挑水或自来水管子提水的必备工具。提或挑回水后，可倒入水缸，也可直接放在家里当储水器具。目前，京西家庭已极为罕见。

水余。铁皮制的小水桶，比手电筒略大，腰上缠铁丝把手，注满生水后放入炉膛内很快就能把水烧开，一余水一般可沏一壶茶。如今水余在京西几乎绝迹。

暖水瓶和茶缸茶杯。暖水瓶。热水的保温器具，由外壳和胆组成。外壳有竹编和铁艺两种，后来还有铝壳或不锈钢壳的；胆如不带引信的炸弹，小口，身如圆柱，底向下凸起，玻璃质，表面水银封裹；瓶胆可盛三四升热水，盖上封口后可保温一昼夜以上。

最早，暖水瓶是奢侈品，之后在特种场合下单位才作为奖品发放个人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家庭必备，如今已被压力水壶或饮水机取代。

茶缸茶杯。大家常见，有搪瓷的、瓷质的和玻璃的，不多说了。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用酱菜瓶子或罐头瓶子作饮水茶具，还套上编制网套以防沏上热茶后烫手，成为那时的饮水一景。

京西在饮用水质量和饮水器具上步步登高，一步一重天，习俗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特别是近十几年来，在饮水观念上，人们也从以实用为主，向卫生、方便、快捷转变，逐步与时代合拍。时代在前进，习俗在变迁，京西人们饮水习俗的变迁是石景山区社会进步的见证之一。

# 京西地区公交车的发展

李永俊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百业待兴的阶段，北京郊区的家乡交通及出行都很不便。有钱人能雇洋车，大多平民皆徒步，骑驴坐马车也是有条件的人家。当年我父亲往城里送果子，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行40多里路就靠着两腿和肩膀，起早贪晚要走80里一个来回儿。1952年我们村边修了一条马路，多是从门头沟往城里运煤的骆驼与马车。

1953年，从阜成门到京西运营的有了一种私营的公交车。车的后边还背着一个小火炉，是靠此物烧煤炭或劈柴来驱动汽车行驶。虽然这种汽车载客量很小(只能容纳十多人)，车厢内设施也很简陋，但大多数的百姓也坐不起。那时的市郊路不太平坦，此车行驶在路上不但噪音较大，且车厢内还有振动感，载重量大了或爬坡常爱抛锚的现象最叫人心烦。特别是遇上降雨天，更容易熄火。记得有一次我跟着老爸从城里乘此车回家，本来途经模式口汽车爬坡就非常费劲，忽然又下起雨，车子立马灭了火，弄得乘客六神不安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司机和售票员就得冒雨赶快下车，又是往锅炉里添劈柴和煤炭，又是摇鼓风机。点燃的煤柴一劲儿地冒烟，好不容易才烧旺充上气，人已累得疲惫不堪，因此人们都管那种车叫“烟泡”，待车子发动着了重新上路，已是夕阳下了山。除此之外，儿时在离我家几尺远的公路上，常能见到公交师傅与售票员为制动汽车熄火之所付出的劳累与艰辛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，北京的城市交通得到逐步改观。很多市民出行即可乘公交车及有轨电车，比起以往畜力或洋车代步有了很大改善。但在我们京西家乡，人们出行拥有自行车者还是凤毛麟角，谁家有辆自行车都会当成心爱之物，更会让乡亲们刮目相看。居住在山区的百姓出行道路不便，出门办事骑驴或坐马车者也是常见的现象。而当地百姓最普遍的出行方式，则是壮年人大都靠两条腿徒步。记得在我上班工作那时期，有几次同事相约聚会，到达了地点之后，若有人问某同事是怎么来的？对方往往会戏称是“11路”。那时，虽然在北京市近郊区也开通了35、36、37、54、39路等几条公交车路线，但因车次较少，人们出行乘车需要等待很长时间。

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燃机汽车的大量生产，烧锅炉的汽车被淘汰。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石景山区有了从京城至当地36、37路单箱的公交车。那时期，凡是石景山区要进城的人只有乘这两路车。赶上早晚高峰时段，挤不上车是常有之事。后来，37路又增加了一种捷克式后面带拖挂的公交车，这样可多容纳一些乘客，使乘车难问题得到缓解。当年我在城里美校上学时，每个星期天都要坐36路公共汽车回五里坨。有时车到模式口爬坡，常因乘客多或天气热车子的水箱开锅。司机只好将车停在半路，待重新换入凉水后再运行。

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路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在



车顶上驮着一个大气包的公交车。当年我经常到城里办事，这种车也没少乘。这是由于当时汽油尚不太充足，公交部门采取的办法。公交车上这种黑色橡胶制作的庞然大物，是将其充满煤气后作为汽车动力用的。因汽车在行驶过程中需要消耗煤气，气包也逐渐由大变小。每赶上刮风天，车子行驶时上边那大气包便哆里哆嗦，晃悠悠。这种驮气包的公交车，堪称那个时代的特殊一景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北京交通事业飞速发展，四通八达的公路宽阔又平坦。且公交车次大增，车的种类也不断更新。而采取了高科技现代化的车辆配备有电视、空调等设施，其车型美观、敞亮、舒适，载客可达上百，人们乘坐既快捷又安稳。往昔那“烟泡”及“驮气包”的公交车已消失殆尽，在人们的印象中已渐行渐远。如今很多经济生活富足的当地居民，出行都拥有了私家的小卧车，在这个新时代，今昔相比真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